

欧洲缘何泛起排斥穆斯林族群的思潮？*

宋全成 温婧

内容提要 “九·一一”事件后，欧洲出现排斥穆斯林族群的思潮，且在阿拉伯剧变后尤其是随着难民危机的发生，这种思潮愈演愈烈。其原因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即“伊斯兰威胁欧洲”的虚假镜像是穆斯林族群被排斥的社会心理因素；历史冲突记忆和现实恐怖主义袭击是导致欧洲穆斯林族群被排斥的历史和现实因素；族群问题的政治化与工具化是导致欧洲穆斯林族群被排斥的政治因素和媒体因素。欧洲民众的反穆斯林情绪上升，一方面反穆斯林的极右翼政党崛起，导致欧洲政坛民粹化；另一方面，欧洲穆斯林族群的处境更加艰难。当下，全面评价欧洲穆斯林族群在移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正确区分整个穆斯林族群与穆斯林中个别极端恐怖分子，破解穆斯林移民在社会融入、身份认同方面面临的困境，是欧洲各国政府及民众亟待解决的严峻问题。

关键词 排外主义 欧洲穆斯林 难民危机 “伊斯兰威胁欧洲”

作者简介 宋全成，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济南 250100）；温婧，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副研究员（济南 250100）。

“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是欧洲社会涌动排斥穆斯林族群思潮的重要时间节点。此前，无论是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还是政治精英都对穆斯林族群在欧洲的存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此后，以美国为首、一些欧洲国家参与其中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战争等影响地缘政治重大事件的发生，推动了极端伊斯兰主义从中东向全球蔓延，宗教极端恐怖主义思潮在全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欧盟的难民危机、移民融入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7BMZ091）、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研究项目“当今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研究”（2018-GMB-064）阶段性研究成果。

球泛起。在欧洲，该地区国家内穆斯林族群中内生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响应恐怖组织的召唤，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针对欧洲国家的恐怖主义袭击。伦敦地铁爆炸案、马德里爆炸案等都是他们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的一个缩影。阿拉伯剧变以来，难民危机席卷欧洲，大批穆斯林难民的涌入以及在欧洲国家发生的暴恐事件，如伦敦议会大厦爆炸案、曼彻斯特体育馆自杀式炸弹袭击案等等，不仅给欧洲当地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失，更为严重的是，欧洲国家从政治精英到社会大众对穆斯林族群中的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的敌视转化为对整个穆斯林族群的警惕、不安和拒斥的情绪。由此，欧洲国家部分民众中潜在的种族主义思潮沉渣泛起，出现对欧洲穆斯林族群的强烈排斥现象。

2012年10月，法国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IFOP）曾进行了有关伊斯兰教及法国穆斯林形象的民意调查，其结果是：43%的受访者认为穆斯林对法国的国家认同构成威胁，67%的受访者认为穆斯林完全没有或者没有很好地融入法国社会，68%的受访者认为穆斯林拒绝融入法国社会。^①同时，受访者普遍认为，伊斯兰教就是拒绝西方价值、狂热、顺从和暴力。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欧洲国家民众不乏对穆斯林族群持有负面、否定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穆斯林族群拥有落后的宗教文化价值观且倾向暴力；参加“圣战”的恐怖分子或不容异教的宗教极端分子，虽拥有欧洲国家国籍却又固执地保有伊斯兰文化特征，是难以真正融入欧洲社会的最大外来族群。2016年，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西班牙、匈牙利、奥地利、希腊和波兰10个欧洲国家就“是否同意停止接收所有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移民”进行调查，选择“同意”的受访者民众比例偏高，波兰为71%，奥地利为65%，德国为53%，意大利为51%，英国为47%，西班牙为41%。^②由此可见欧洲国家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的恐惧具有普遍性。在欧洲排外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穆斯林族群在欧洲国家的处境也变得尤为艰难。

当前，在难民问题和恐怖主义袭击困扰欧洲的背景下，国内学术界虽然对欧洲穆斯林族群的研究多有涉及，但从多元视角对欧洲社会对欧洲穆斯林

^① 陆华：《“伊斯兰恐惧症”：被排斥和受损害的穆斯林》，<http://news.163.com/15/0109/09/AFGQEOP700014AED.htm>，2018-07-10。

^② 邱显平、唐松：《蔓延西方社会的“伊斯兰恐惧症”》，载《世界知识》2019年第9期，第66页。

族群排斥原因的解读尚不深入。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学理和实证方面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以便厘清该问题的内在机理。

长期的社会心理因素：“伊斯兰威胁欧洲”的虚假镜像

对于每一个外来族群，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和本土民众往往会依据自身承载的文化标准来衡量或评价这一外来族群。而作为欧洲地区最大外来族群的穆斯林，具有独特的伊斯兰文化特征，他们在日常生活、价值观等方面与欧洲国家的本土主流族群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常常会被欧洲本土人冠以一些带有歧视性或者负面的标签，由此产生被排斥的现象。

总体看，欧洲穆斯林具有以下主要特征：第一，在人口学意义上，欧洲穆斯林具有高生育率和人口结构年轻的特点。与欧洲国家本土民众出生率极低和人口结构高度老龄化情势不同的是，由于伊斯兰教鼓励生育，欧洲穆斯林的生育率明显高于欧洲本土民众，由此，穆斯林族群的人口结构呈现出高度年轻化的特征。2017 年 11 月 29 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了最新的欧洲穆斯林人口调查研究数据。从生育率来看，相比其他宗教信徒或无特定宗教人士，穆斯林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 2.6，而非穆斯林妇女仅为 1.6，由此造成穆斯林人口结构日趋年轻化。在欧洲，15 岁以下的穆斯林占比为 27%，几乎是而非穆斯林人口比例的 2 倍。^① 由于上述原因，欧洲的穆斯林人口在未来几十年里将大幅增长，部分国家的穆斯林人数甚至会翻三倍，这将最终改变欧洲国家的族群结构。这是因为，一方面，欧洲国家本土民众的总和生育率较低，人口总量一直处于低增长或负增长状态，特别是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攀升，由此，欧洲国家的人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萎缩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穆斯林人口总和生育率高，且人口结构年轻，由此人口增长潜力巨大。伴随着穆斯林人口数量的逐年增加，穆斯林人口在欧洲国家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提高。即使在欧洲各国停止接收移民，即在“零移民”的情况下，欧洲的穆斯林人口仍然有望在 2050 年上升到 5 500 万，占欧洲国家总人口的 7.4%。^②

^① “Europe’s Growing Muslim Population”, <http://www.pewforum.org/2017/11/29/europes-growing-muslim-population>, 2018-07-10.

^② Ibid.

欧洲国家本土主流族群与外来穆斯林族群之间人口数量的此消彼长,让欧洲国家的本土民众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安与危机感。如果这一趋势长期持续下去,则意味着穆斯林族群在某些地区或城市会取代本土民众,他们由最大少数族群转变为这些地区或城市的主要族群。对此,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就宣称:“已有很多迹象显示,真主将引领伊斯兰在欧洲获得胜利——不是用刀,也不是用枪,也不用征伐;在未来几十年,5 000 万穆斯林进入欧洲,会把它变成伊斯兰的洲际大陆。”^① 政治家的这种欧洲国家人种结构即将伊斯兰化的蛊惑人心的政治策略,对欧洲国家的民众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影响,并由此产生排斥穆斯林族群的社会心理。实际上,穆斯林族群在欧洲地区的发展即使达到 7.4% 的人口总量,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欧洲国家人口的族群结构和文化属性。

第二,在文化学意义上,欧洲穆斯林族群拥有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异质化的伊斯兰文化。欧洲穆斯林族群所拥有的伊斯兰文化与西方主流基督教文化尽管存在宗教文化上的同源性,但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两种宗教文化有交融、有碰撞,并产生显著的差异性。伊斯兰文化以宗教教义为核心,凸显宗教的神圣性,强调人要服从神的旨意,取消或弱化个人,有政教合一的传统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而欧洲基督教文化在宗教改革以后则以世俗化为核心,强调人权,重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主张用理性战胜神权,实行政教分离的政治制度。^② 这两种迥然不同文化在欧洲大陆的相遇和碰撞,在其他因素的互动下,易导致各种摩擦与冲突。现以服饰和清真寺为例,加以说明。

服饰本来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具有显著的政治文化意义,但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都被赋予了政治文化的浓厚色彩。在伊斯兰文化中,公开场合的穆斯林女性普遍被要求穿着罩衫,头发和全身等需要用罩衫加以遮盖。在一些穆斯林女性看来,这一做法能够降低自己在衣着方面的吸引力,从而阻断将女性物化的男性目光,并由此得到公平和尊重的对待。法蒂玛·纳斯福博士在其著作《伊斯兰的妇女》中,就将穆斯林女性的头巾视为维护女性端庄和受人尊重的表现。但在基督教文化视域中,穆斯林妇女穿戴的头巾和罩袍是蔑视人权、不尊重妇女的象征。这种文化观念上的冲突在法国表现得尤为突出。法兰西人认为,穆斯林族群要求妇女戴头巾和罩袍的

^① 《欧洲伊斯兰化,这才是全球最大的黑天鹅!》, https://www.sohu.com/a/122665532_488070, 2018-7-11。

^② 纪红蕾:《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研究》,外交学院博士论文,2017年6月。

理念，与奉行世俗、共和、平等的法国主流社会的价值理念相悖。因此，自2010年以来，法国以禁锢女性自由为由禁止妇女在公共场合穿戴蒙面长袍布卡。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曾明确指出：“布卡的问题不是一个宗教的问题，这是一个自由的问题，是女性尊严的问题……布卡象征着对女性的压制和女性的屈服，我想郑重宣布，布卡在我们的领土上不受欢迎。”欧洲一些政治精英将布卡称为“移动监狱”。^①在此之前的2004年，法国率先颁布了“公立学校内禁止佩戴明显宗教标志”的法案，此后荷兰、比利时等国家也先后通过罩袍禁令，禁止欧洲国家的穆斯林妇女在部分公共场所穿着罩袍及面纱。由此可见，只是作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的服饰文化的差异，被赋予了高度的政治文化色彩的对立与冲突，有时被视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侵略”。

清真寺建筑是穆斯林族群与欧洲国家政要和民众争论不休的又一重要话题。由于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实行多元主义的文化政策，政府不干预宗教的发展，因此，在沙特等中东伊斯兰国家人力和财力的支持下，清真寺的数量也在迅速增长。欧洲国家的穆斯林正是在这一座座散落在欧洲各国的清真寺里，延续着个体所特有的伊斯兰教信仰及其族群的文化价值观。但对于欧洲国家本土民众而言，清真寺是外来文化——伊斯兰文化的象征，而且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交融与对抗延续了1400多年，清真寺的剧增正在对日益式微的西方基督教主流文化造成威胁。为了遏制伊斯兰文化在欧洲的扩张、维护西方主流文化的地位，部分穆斯林族群聚集的西欧国家试图采取措施限制清真寺的数量及其发展。2009年，瑞士政府通过全民公投，禁止修建新的清真寺宣礼塔。在拥有约470万穆斯林、2500座清真寺的德国，也于2018年12月计划征收清真寺税。德国执政的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副主席弗雷明确表示，征收清真寺税有利于“让德国的穆斯林从外国的影响中解放出来”。目前，德国的许多穆斯林协会和社区都是从阿拉伯国家或土耳其得到资助。土耳其问题研究专家布卢姆表示，土耳其甚至还给伊斯兰教士们发工资，这也是土耳其在德国穆斯林社区中影响力很强的原因。^②以清真寺为代表的伊斯兰文化迅速扩张、基督教文化的式微及在服饰

^① 《萨科齐表示法国不支持妇女穿全身式罩袍》，<http://news.sohu.com/20090622/n264686676.shtml>, 2018-09-12。

^② 《德国计划征收“清真寺税”以减少德国穆斯林受国外影响》，载德国中文网：http://www.germanycn.com/news/detail/id/11178/cate_id/12.html, 2018-12-27。

与宗教建筑理解方面的迥然相异，激起了欧洲国家一些民众潜在的种族主义社会思潮的崛起，以及他们在政治上对伊斯兰文化的排斥。

第三，在宗教学意义上，欧洲穆斯林族群具有强烈的宗教认同感。生活在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的穆斯林族群，尽管面临基督教占主流地位之情势，但并没有融入主流宗教而皈依基督教；相反，如前所述，他们对伊斯兰教始终拥有更强烈的宗教认同感。由此，与其他外来族群相比，欧洲穆斯林移民完整而最好地保留了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文化与宗教。目前，穆斯林族群已成为欧洲国家的第一大外来族群，伊斯兰教已是欧洲国家的第一大外来宗教。穆斯林族群无论是第一代移民，还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总是将伊斯兰教教育和仪式寓于每天的生活之中，伊玛目们通过清真寺这一公共场合，引导穆斯林信仰和宣扬伊斯兰教义，每天五次的祈祷、斋戒和必须遵守的宗教仪式固化了穆斯林族群的信仰及其生活方式，而其亲属朋友和居住的穆斯林社区也发挥着管理和监督作用。^① 由此，诸多欧洲穆斯林移民看似分散，但实际上紧密地组成一个个社团，在移居国家扎根并繁衍，形成了与主流社会宗教和世俗文化相异的“平行社会”。为了促进穆斯林族群的社会融合，特别是宗教融合，法国政府曾试图鼓励穆斯林移民与法国人通婚，但绝大多数的穆斯林移民仍选择在族群内部通婚。如果当地的穆斯林男人没有找到合适的穆斯林女性结婚，他们也会选择原祖籍国的穆斯林姑娘通过家庭团聚的方式移民法国。^② 如果穆斯林男子或妇女选择与非穆斯林通婚，则会要求对方皈依伊斯兰。正因为如此，与穆斯林结婚的法国人绝大多数都放弃了基督教信仰而皈依伊斯兰教，从而成为法国穆斯林族群的新成员。

简而言之，上述穆斯林族群自身所具有的人口学、文化学和宗教学意义上的某些特征，是导致欧洲国家民众形成“伊斯兰威胁欧洲”的社会基础，也是诱发欧洲民众对穆斯林族群进行排斥的重要社会心理因素。事实上，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增加、清真寺的增多、异质文化习俗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欧洲要“伊斯兰化”。这是因为，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欧洲主流族群、欧洲文化的发展并不是静止的，也不是孤立的，而一直是在民族与文化融合冲突过

^① 汪波：《欧洲穆斯林问题研究》，时事出版社，2017年版，第285页。

^② 宋全成：《穆斯林移民在欧洲：身份认同及其冲突》，载《西亚非洲》2016年第1期，第24～25页。

程中向前发展从而形成新的文化，欧洲文化模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模式。即使是保留自己的信仰和生活习惯的欧洲穆斯林，也会认同民主、自由、平等的基本价值观。此外，从文化本身来看，无论是伊斯兰文化，还是基督教文化，各具独特价值，其文化本身并不存在天然的冲突与威胁。之所以在现实社会中具有不同文化价值观背景的人产生摩擦甚至冲突，是源于文化本身的“不自觉”性特点。基于历史传统与思维模式的逻辑惯性，不同民族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会不自觉地用己方的文化标尺和价值观念来衡量对方，习惯于“自我参照”。就这个意义而言，欧洲民众更容易根据基督教的文化个性去判断穆斯林群体的行为，由此造成文化冲突。

历史和现实因素：历史冲突记忆和现实恐怖主义袭击

欧洲穆斯林族群被排斥的现象由来已久，其成因既有宗教冲突的历史因素，也有恐怖主义袭击的现实因素。加之，欧洲穆斯林族群的社会融合不佳和极端分子激烈反抗欧洲国家主流社会的做法，使得欧洲国家的民众对伊斯兰教的成见和对穆斯林族群的排斥不断加深。

第一，基于历史记忆而形成的基督徒与穆斯林视对方为异教徒的“敌对”成见，是导致欧洲穆斯林族群被排斥的历史因素。尽管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产生于耶路撒冷的世界性宗教，具有同源性，但从历史上看，两种宗教及其宗教影响下的信徒的交融与冲突绵延了 1 400 多年。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日起，阿拉伯人便开始了对欧洲地区的扩张和征服。“公元 7 世纪后期，伊斯兰历史上第一哈里发王朝——伍麦叶哈里发大军的对外扩张势如破竹，669 年占领了西西里岛，据此称霸西地中海。”^①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穆斯林大军横扫千军，随后占领西班牙，开启了他们在欧洲长达 800 年的统治。但到公元 11 世纪，尤其是从 1095 年到 1291 年，伴随着欧洲基督徒势力的强大，在罗马教廷的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发起了以夺回圣地耶路撒冷为目标的长达两个世纪的对伊斯兰国家的“十字军东征”。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由此伤痕累累并在内心种下了对基督教仇恨的种子。

^① 王宇洁：《征服与被征服：穆斯林与欧洲关系的历史解析》，载《文化纵横》2015 年第 6 期，第 44 页。

13 世纪末奥斯曼土耳其崛起以后，开始对基督教国家的复仇，首先实现了对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征服。到了 15 世纪中期，土耳其人征服了有着基督教千年历史的拜占庭帝国，将有着浓郁基督教色彩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改名为具有显著伊斯兰教风格的伊斯坦布尔，作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新首都。但土耳其人并没有停止向西、向北征服欧洲基督教国家的步伐，以至于土耳其人数次兵临欧洲名城维也纳。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强盛时期，地中海几乎成为其内陆湖。但到 16 世纪以后，与奥斯曼帝国逐渐衰落相伴随的是，西欧民族国家强劲兴起且开辟新航路，欧洲基督教国家又通过坚船利炮开启了建立殖民地的历史进程。由于地缘关系和历史因素的双重影响，当时的欧洲强国在亚、非、拉等地建立起了庞大的殖民主义体系。其中，伊斯兰教广为传播的中东地区亦沦为欧洲列强的统治范围。

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基督教国家建立的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伊斯兰世界在欧洲殖民地的废墟上纷纷建立起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同时，伴随着欧洲国家的重建，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开启了迁移到欧洲国家的历史。到 20 世纪末，欧洲的穆斯林族群已达到 2 000 万人的规模。尽管战后欧洲国家奉行多元主义文化，但延续 1 400 多年的征服、敌对、仇恨依然在彼此信徒的心里留下了历史烙印。这种冲突历史记忆使欧洲国家的民众对穆斯林持有或多或少的“敌对”成见，一旦现实生活中出现基于两种宗教文化背景的冲突事件，就有可能激活这种不快的历史冲突记忆，导致欧洲民众排斥穆斯林族群。

第二，受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由伊斯兰极端分子在欧洲实施的针对欧洲国家民众且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系列恐怖主义袭击是欧洲穆斯林族群被排斥的重要现实因素。

进入 21 世纪以来，受到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阿拉伯变局的持续影响，中东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潮进入新的活跃期，且产生外溢效应。就恐怖组织而言，无论是危及世界和平的“基地”组织、“伊斯兰国”，还是危及地区安全的其他众多恐怖组织，如“沙巴布”（即索马里“青年党”）、“博科圣地”等，多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地缘关系和欧洲族群关系因素，欧洲成为宗教极端组织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的多发地。马德里爆炸案（2004 年 3 月 11 日）、伦敦地铁爆炸案（2005 年 7 月 7 日）、《查理周刊》枪击案（2015 年 1 月 7 日）、巴黎枪击爆炸案（2015 年 11 月 13 日）、布鲁塞尔机场爆炸案（2016 年 3 月 22 日）、尼斯车碾案（2016 年 7 月 14

日)、柏林圣诞市场车碾案(2016 年 12 月 19 日)、伦敦议会大厦车碾案(2017 年 3 月 22 日)、曼彻斯特体育馆爆炸案(2017 年 5 月 22 日)、巴塞罗那恐袭案(2017 年 8 月 17 日)等相继发生,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

上述实施恐怖袭击的行动者均有伊斯兰极端主义背景,有的采用“独狼”式袭击方式,有的与宗教极端恐怖组织相关联,其中有一部分恐怖分子不仅在一些国家接受过恐怖主义的相关训练,并且还得到了外来伊斯兰势力的支持。他们发动的这些恐怖行动通常接受恐怖组织的指令,或者响应恐怖组织的号召,以造成大范围恐慌性影响和吸引各国穆斯林极端分子的投靠与效忠为目的。因此,恐怖分子通常将恐袭地点选在地铁、机场、火车站、体育场、市场和教堂等人群密集地,且采取砍杀、枪击、爆炸、车辆冲撞等方式,作案手段极为暴力、残忍,造成欧洲国家众多无辜群众的伤亡,并且给欧洲国家民众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尽管这些宗教极端组织发动的恐袭事件是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暴力恐怖主义相互勾连的产物,不应与这些恐怖分子所属的特定族群相挂钩,但对于欧洲国家的社会大众而言,他们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组织的惊恐极易被放大为对整个穆斯林族群的恐惧与拒斥。

第三,欧洲难民危机加剧了欧洲穆斯林族群被排斥的程度。随着在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等国家角力下的叙利亚局势不断恶化和北非地区战乱的纷扰,2015 年以来,每年数以十万计甚至百万计的饱受战乱蹂躏与摧残的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家及北非地区的难民如潮水般涌向欧洲,最终造成了对欧洲国家和欧盟日益严重的难民问题。由于难民中绝大多数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因此,穆斯林难民在欧洲的激增使原本存在于欧洲国家的穆斯林族群被排斥的问题更加严重。

截至 2017 年 12 月,近 323 万难民在欧洲国家提出避难申请。2015~2017 三年,在欧洲 32 国提出避难申请的难民人数分别是 132.6 万、123.6 万、67.6 万。^①在难民申请者中,75% 以上的难民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们主要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及北非国家。剧增的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难民,以及欧洲各国政府为救助和安置这些难民而增加的财政预算,加剧了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众此前就对包括穆斯林族群在内的外国移民在就业竞

^① 笔者根据欧洲统计局公布的 2015~2017 年避难者和首次申请庇护身份的月份数据(Eurostat Data, Asylum and First Time Asylum Applicants - Monthly Data)整理所得。

争和降低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担忧。为了甄别、安置这些历尽千辛万苦、远离家乡前来欧洲各国申请避难的难民，相关欧洲国家需有巨额的财政支出，用以支付难民的住所、衣食、零用钱、医疗和管理等费用。特别是接纳难民申请最多的德国，面对数以十万计的难民申请者，移民与难民部的工作人员不堪重负。为此，德国联邦政府一方面为移民与难民部新增了 2 000 名工作人员，以应对避难申请审核的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增加难民安置费用（2016 年为 199.1 亿欧元、2017 年为 200 亿欧元）。这还不包括为难民进行语言和工作技能方面的培训，以帮助难民更好地融入德国社会的相关费用。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德国政府的社会福利投入和支持经济发展的投资，从而引起德国国民对难民尤其是被认为是难以同化和融合的穆斯林难民的忧虑和不满。2015 年 9 月到 12 月，德国民意对难民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欢迎难民转变为对接纳难民尤其是穆斯林难民感到担忧。来自德国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2015 年 9 月，仅有 38% 的德国人对难民潮深感忧虑。然而，在实施欢迎难民政策并有 50 万难民涌入德国之后，同年 12 月这一数据便上升至 52%。被访者当被问及对难民潮担忧的主要原因时，85% 的民众认为难民会给本国政府带来财政负担，78% 的人担心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族群及其宗教文化对德国主流社会文化产生过大影响，50% 以上的德国人害怕难民会形成就业竞争以及对德国的社会福利保障造成巨大压力。^① 2016 年的调查显示，抱怨穆斯林人数过多的德国民众从 2009 年的 32.2% 上升到 2016 年的 50%；支持禁止穆斯林移民的人数从 2009 年的 21.4% 上升到 2016 年的 41.4%。^② 可以说，穆斯林难民的涌入加重了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民众的不安、忧虑与排斥。

而由难民中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实施的系列针对欧洲国家的恐怖主义袭击，进一步加深了欧洲国家的民众对穆斯林族群的排斥程度。面对数以百万计难民的涌入，让欧洲民众更为担忧的是，伴随着难民尤其穆斯林难民的到来而不断增加的恐怖主义威胁，无论是混入难民队伍中来自叙

^① “ARD – Deutschland Trend: Mehrheit unterstützt Transitzone”, *Tagesschau*, <http://www.tagesschau.de/inland/deutschlandtrend-437.htm>, 2018-09-20.

^② Ayhan Şimşek, “Anti – Muslim Sentiment in Germany Hits Record High”, Anadolu Agency, June 15, 2016, <http://aa.com.tr/en/europe/anti-muslim-sentiment-in-germany-hits-record-high/590291>, 2018-09-20.

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或是被恐怖组织招募的包括欧洲国家的公民，或者是欧洲国家的第二代、第三代穆斯林中的宗教极端主义者，都可能激变为极端恐怖分子，从而给欧洲国家带来极大的社会安全隐患。事实上，欧洲国家尤其是穆斯林族群人数较多的西欧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荷兰等国均面临与难民潮相关的安全威胁。除了法国遭受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袭击较多之外，德国作为接受难民尤其是穆斯林难民最多的国家，也饱受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家的恐怖主义分子制造的恐怖袭击的伤害。2015年新年夜德国科隆发生多起性侵案件，一些作案者被证实有难民背景，这一案件在德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导致了民众对欢迎难民政策的激烈抨击和对穆斯林难民的强烈拒斥。2016年7月18日，一名17岁的阿富汗难民在维尔茨堡附近的一列火车上执斧袭击乘客，致使5人受伤。7月24日，一名27岁的叙利亚难民在安斯巴赫音乐节实施自杀袭击，造成15人受伤。2016年10月，阿富汗难民侯赛因·卡瓦里在德国弗莱堡大学城作案，杀害了当时年仅19岁的医学系学生玛利亚·拉登堡。

凡此种种，这一系列恐怖袭击案件的发生，尽管是极少数穆斯林难民所为，但客观而言，则强化了整个穆斯林难民在包括德国民众在内的欧洲民众眼中的“暴力”“疯狂”“野蛮”的形象，且把“难民-穆斯林族群-恐怖主义”关联起来。2016年美国皮尤中心曾针对10个欧洲国家的国民，开展了关于难民、穆斯林及恐怖主义的相关性调查，调查数据显示：除法国和西班牙之外，其他欧洲国家的民众都普遍认为“难民会增加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同时，调查结果还显示，欧洲民众对难民的负面看法、对穆斯林族群的负面看法与恐怖主义的看法三者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接受调查的10个欧洲国家中，国民对穆斯林持负面看法的人更关注难民尤其是穆斯林难民对其所在国家造成的恐怖主义威胁，80%的英国受访者认同这一论断。约60%的德国、荷兰、意大利民众认为激增的穆斯林难民会增加他们国家恐怖主义的风险。^①毫无疑问，大量难民尤其是穆斯林难民涌入欧洲国家，使得欧洲国家的穆斯林问题、难民问题与恐怖主义问题相互交织，这不仅使欧洲民众对穆斯林难民产生草木皆兵的恐惧感，同时也加剧了他们对整个穆斯林族群的抗拒心理。

^① European Opinions of the Refugee Crisis in 5 Charts,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9/16/european-opinions-of-the-refugee-crisis-in-5-charts/?amp=1>, 2018-10-22.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伊斯兰极端分子并不能代表整个伊斯兰，他们只是打着宗教旗号，断章取义地利用伊斯兰典籍中的只言片语，对伊斯兰经典、教义作出的异化解释。而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结合，即针对欧洲各国制造的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会产生“倍增”的破坏力和影响力，从而“污化”了整个穆斯林族群。尽管在庞大的欧洲穆斯林族群中，极端伊斯兰分子和恐怖分子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但由于信仰同一宗教且实施恐怖主义袭击者相当一部分是欧洲国家内生的穆斯林国民，因此，欧洲国家的普通民众极易以偏概全，将“落后”“野蛮”“暴力”的标签贴在所有穆斯林身上，甚至将穆斯林同恐怖分子相关联，加深欧洲民众对他们的误解。

政治和媒体因素：族群问题的政治化与工具化

在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反移民、反难民的极右翼政党及其政治精英的存在，让欧洲的族群问题特别是穆斯林族群问题政治化。而不能全面反映伊斯兰族群整体面貌、极容易放大穆斯林族群问题及其负面影响的大众传媒，成为欧洲民众排斥穆斯林族群的重要传媒工具。

第一，极右翼政党与反穆斯林著名精英发表的攻击穆斯林族群的言论，并获得部分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是造成穆斯林族群被排斥的重要政治因素。回望历史，反对外来移民、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曾在欧洲历史发展上登峰造极地发展为法西斯主义，由此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600 万犹太人的死亡。因此，二战结束以后，欧洲各国通过立法等形式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严加防范。欧洲各国主流政治界空前喧嚣的种族主义虽销声匿迹，但并没有根绝，而是深藏于欧洲国家部分政治精英和民众的内心深处。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诱发的欧债危机在欧洲蔓延，为反对与排斥外来移民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提供了契机。面对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上升和社会治安案件居高不下的状况，欧洲各国的民众陷入了深深的焦灼与不安之中。在近年的欧洲各国的议会选举、总统大选和欧洲议会选举中，移民问题尤其是穆斯林移民问题历来成为政治选举的焦点。欧洲极右翼政党则乘机将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归罪于外来移民和难民，并将一系列社会治安问题尤其是犯罪率上升问题等归因于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难民的进入，他们以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为旗帜，强烈反对接收外来移民，尤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难民。极右翼政

党的反移民、反穆斯林难民的主张迎合了部分失业者、低收入者和具有排外倾向的中下层民众的心理，因而获得了部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其支持率一路飙升。

为了争取更多的政治选民的支持、寻求自身的政治利益，欧洲各国的极右翼政党近年来一直在刻意宣扬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给欧洲国家带来的潜在威胁。而穆斯林族群作为欧洲最大的外来族群，理所当然地成为极右翼政党的攻击矛头。法国国民阵线党领导人玛琳娜·勒庞在2010年12月把穆斯林的祷告声比作“入侵”。^①2017年，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主席弗里克·佩特里提出，默克尔的难民开放政策是二战屠杀犹太人的矫枉过正，德国应反对大批中东难民入境德国。她公开声称，警方可以对非法入境的难民开枪。该党竞选纲领还包括以下内容：德国穆斯林族群所信奉的“伊斯兰教有违德国法治体系，应全面禁止修建清真寺宣礼塔、禁止宣礼员在宣礼塔唱经。”^②尽管德国选择党的这一纲领违背了德国宪法赋予民众宗教信仰自由以及禁止宗教歧视的规定，但也获得了德国部分民众的支持。因此，该党已成为德国议会的第三大政党。因此，具有极右翼倾向的政治家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往往将某些事关穆斯林族群的负面事实加以夸大，甚至是故意释放一些错误信息，来煽动人们对于穆斯林族群的偏见与仇恨，以此表明其明确的“欧洲反穆斯林化”的鲜明立场。“就在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当天，佩特里作为东道主在德国城市科布伦茨举行了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聚会，与法国的勒庞以及荷兰的威尔德斯等欧洲右翼政客齐聚一堂，共商‘反欧洲伊斯兰化’等议题。”^③

除了政治家以外，欧洲国家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反伊斯兰精英所发表的针对穆斯林族群的负面言论也具有较强的号召力与煽动性，容易引起部分民众的共鸣与支持，从而加速对穆斯林族群敌对情绪的蔓延，并进一步推动穆斯林族群被排斥程度的加深。德国《星期日图片报》副主编尼古拉斯·凡斯特在《伊斯兰教是融合障碍》的评论文章中明确指出“我反感具有伊斯兰教背景的青少年犯罪率超出平均水平，我反感伊斯兰教对女性和同性恋那种致

^① 《法国种族主义愈演愈烈欧洲议会表示担忧》，载凤凰网资讯网：http://news.ifeng.com/a/20160303/47672034_0.shtml。2018-10-16。

^② 任珂、袁帅：《德极右翼政党称伊斯兰教有违法治体系被指违宪》，载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w/2017-09-12/doc-ifykufzt6456197.shtml>，2018-10-16。

^③ 田园：《德国选择党的野心与现实》，载《光明日报》2017年3月20日。

命的歧视，我还反感其强制婚姻、荣誉谋杀。宗教是社会融合的障碍吗？我认为，不总是，但具体到伊斯兰教，确实是。这一点，我们应该在吸收移民和难民时加以考虑”^①。虽这一言论招致了主流社会不少的批评与反对，但仍有部分读者在网络评论中匿名支持凡斯特。此外，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经济学家萨拉辛在《德国的自我毁灭》中也指出，穆斯林移民依然信奉伊斯兰教，他们对融入德国社会不感兴趣，不愿依法缴税、不愿为社会作出贡献。“400万穆斯林涌入德国，德国整体识字率和数学计算能力都会‘大幅下降’，德国正逐渐变成一个‘笨蛋国家’”。随后一项民调显示，1/5的德国人表示，如果萨拉辛要组建一个自己的党派，那么他们将会支持这个党派。^②德国默克尔总理也公开承认，“所谓‘多元文化主义（Multikulti）’的概念，即‘我们一起快快乐乐地生活’，已经行不通了。”^③

由此可见，欧洲国家的极右翼政治家们对穆斯林族群负面立场和反穆斯林的言论，以及部分反伊斯兰社会精英关于穆斯林族群的负面和消极影响的主张，迎合了欧洲国家部分民众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偏见，这对于欧洲穆斯林族群的被排斥程度的加深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政治影响。

第二，大众传媒选择性报道欧洲穆斯林族群的负面新闻是导致欧洲穆斯林被排斥的媒体传播因素。根据现代传播学相关研究，以图书、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为代表的传统媒介和基于计算机技术建立起来的互联网、自媒体等现代传播媒介，除了具有文化传承功能以外，还具有引领社会时尚与风气、倡导一定的价值观念、及时报道和评论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从而引领价值导向和舆论导向的重要社会功能。大众传媒关于重大事件的客观、全面报道，是大众了解社会信息和重要事实真相的重要途径。它也被誉为除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是政府的“第四部门”。反之，非客观性新闻报道则会向受众传递不真实的事实。

纵观欧洲国家大众传媒关于穆斯林族群的报道，就会发现：大众传媒并没有全面地报道穆斯林族群的状况，而是选择性地关注穆斯林族群的负面信

^① 孙进：《德媒评论称伊斯兰教让人反感移民话题引争论》，载中国新闻网：<https://www.china-news.com/gj/2014/08-07/6467849.shtml>，2018-10-18。

^② 《默克尔称德国建立战后多元文化社会的努力彻底失败》载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o/2010-10-18/103118247527s.shtml>，2018-10-19。

^③ “Merkel Says German Multicultural Society Has Failed”，BBC，October 17，2010，<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11559451>。2018-10-20。

息。即使在拥有400多万穆斯林的德国,大众传播媒体也鲜有关于穆斯林移民的正面报道。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主流媒体组织结构和媒体从业人员的属性决定的。一方面,媒体机构多是欧洲国家主流社会创办的,这些媒体主导着受众对于穆斯林族群的基本认知。如前所述,欧洲国家的政治精英出于政治利益,片面地把穆斯林族群与国内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社会治安形势相挂钩,由此,他们主导的媒体选择将穆斯林族群相关的负面信息更多地传递给社会公众,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其他族群尤其是主流族群的暴力案件的报道,这无疑强化了穆斯林族群和伊斯兰教在欧洲国家民众心目中的“暴力”“野蛮”和“落后”的形象,同时更加剧了当地民众对穆斯林族群的歧视与偏见。另一方面,从媒体从业者的族群构成来看,掌握着主流社会话语权的媒体从业者,绝大多数来自欧美国家的本土精英,他们中的一些人潜意识中存在着种族主义思想或白人种族优越感。他们在进行某些重大社会事件,特别是与穆斯林族群有关的社会重大事件如恐怖主义袭击的报道时,往往有意无意地贴上“伊斯兰”的宗教标签和“穆斯林”的族群标签。即使有些案件与宗教信仰并无关系,一些媒体依然还是倾向于用“伊斯兰”或“穆斯林”这些敏感词来表征犯罪嫌疑人。英国《每日邮报》曾发表一篇题为《穆斯林团体扎破移民局执法车的轮胎》的报道,指责“穆斯林族群”中的“穆斯林青年”为伦敦东部一起袭击移民执法人员公务车事件的幕后黑手,而事后查明施暴者的宗教信仰当时并不明确,两者也并不相关。尽管《每日邮报》最终承认了这一报道存在错误事实,改写了相关报道,并在其网站和报纸上发表了纠错声明。毫无疑问,新闻媒体有选择性、倾向性的报道对欧洲穆斯林族群的被排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穆斯林族群被排斥的强化者和传播者。而欧洲国家的穆斯林始终是弱势群体,由于不掌握主流社会的传播媒体的话语权,他们只能默默忍受着被排斥为所谓“恐怖主义分子”“罪犯”“懒惰”“落后”的族群,更谈不上取得政治上的话语权了。

客观而言,穆斯林族群由于在受教育程度、收入、住房、职业等方面处于欧洲国家的下层,即使拥有欧洲国家的公民权和国籍,也依然得不到公正待遇。因此,穆斯林族群中的不少青年人时常以焚烧汽车、暴力,甚至犯罪的形式表达自己对欧洲国家主流社会的不满,且更容易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迷惑,而加入伊斯兰恐怖组织的阵营,发起对西方国家的“圣战”。仅以加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德国穆斯林为例,“据德国联邦刑警调查,截至

2015年7月，共有677名来自德国的极端分子，这些人为年龄在22~25岁的男性，超过60%的人拥有德国国籍，约10%的人在移民母国上过学，2/3的前往者在德国境内曾有犯罪记录。”^①这也为欧洲主流媒体排斥穆斯林族群提供了所谓的口实。实际上，任何犯罪分子的违法行为与其宗教信仰情况并无必然关联。正因为如此，欧洲理事会明确指出：“媒体可能为塑造伊斯兰扭曲的形象做出了‘贡献’，不少人将伊斯兰教同极端分子、恐怖主义分子画上了等号，而非视之为一种和平的宗教。”^②由此可见，大众传媒选择性关于欧洲穆斯林族群的负面报道是导致欧洲穆斯林族群被排斥的媒体传播因素。

余论：欧洲穆斯林族群被排斥现象之影响

穆斯林移民问题并非是欧洲社会治理的新问题。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劳务输入、家庭团聚等因素促使大量穆斯林移民至欧洲国家。此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受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以及一些中东伊斯兰国家政治治理、经济因素等影响，陆续也有一些穆斯林以移民或难民身份生活在欧洲。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相关国家的经济恢复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但并未出现高烈度的穆斯林排斥潮。与以往不同的是，21世纪以来，尤其是阿拉伯剧变后陡增的数以百万计的移民/难民潮，与欧洲国家经济衰退情势相叠加，严重冲击着它们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一系列影响社会安全事件的发生、对诸多资源的争夺等等激化着不同族群间的不满，引起欧洲国家从精英到民众的警惕，出现强劲的排斥穆斯林族群的社会思潮。

欧洲穆斯林族群被排斥的社会思潮的泛起，有着复杂的社会综合因素。“欧洲伊斯兰化”的虚假镜像是穆斯林族群被排斥的社会心理因素；历史冲突记忆和现实恐怖主义袭击是导致欧洲穆斯林族群被排斥的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族群问题的政治化与工具化是导致欧洲穆斯林族群被排斥的政治因素和媒体因素。其中，社会心理因素是主观因素，而历史因素、现实因素、政治因素和媒体因素是客观因素。主客观因素的相互交织与互动，最终导致欧洲穆斯林族群被排斥的社会思潮的重新崛起，但这种思潮背后的欧洲经济衰落

^① 《逾800人从德国赴土叙两国加入极端组织》，载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o/2016-02-24/doc-ifxprqea5189584.shtml>，2018-10-21。

^② 转引自贾建萍：《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研究》，载《中国穆斯林》2012年第5期，第59页。

之重要因素不可被忽视。2015年以来,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及北非地区穆斯林难民的到来以及由此带来的系列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发生,不仅进一步加深了欧洲民众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敌对心理,而且加剧了欧洲国家主流族群与穆斯林族群的紧张关系,加深了穆斯林族群被排斥程度。

这种所谓“伊斯兰威胁欧洲”或“难民-穆斯林族群-恐怖主义”相关联甚嚣尘上的舆论,无论对欧洲政坛还是穆斯林群体均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欧洲民众的反穆斯林情绪上升,反穆斯林的极右翼政党崛起,导致欧洲政坛民粹化。接纳难民尤其是叙利亚穆斯林难民数量最多的德国,成为欧洲“反伊斯兰化”运动的急先锋。“爱国欧洲人反对伊斯兰化运动”(“PEGIDA”,以下简称“欧洲反伊斯兰化运动”)2014年10月成立于德国东部地区的德累斯顿,起初参加者不过数百人,但随着大量穆斯林难民潮水般涌入德国等欧洲国家,以及随后由穆斯林难民中的恐怖分子和穆斯林移民中的恐怖分子联合发起的系列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频繁发生,参加“欧洲反伊斯兰化运动”的人数迅速膨胀到数万人。集会地点也从最初的德累斯顿迅速扩散至柏林、科隆、慕尼黑、波恩、杜塞尔多夫等多个城市,游行出现在德国近30个大小城市,仅德累斯顿就超过2万人参加,还有18个欧洲国家的支持者响应。他们提出的政治诉求核心是:保卫基督教与犹太教共同所有的价值观,防止欧洲伊斯兰化,同时要求政府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以限制欧洲不断增加的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①,因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是欧洲的敌人”。^②“欧洲反伊斯兰化运动”在德国政坛引发了极大争议,德国总统和总理先后对这场运动提出了严厉批评。默克尔认为这些抗议者的心中满是偏见、冷漠甚至仇恨。她在2016年新年致辞中呼吁德国人不要追随这场充满种族主义的运动。“德国内政部长德迈齐埃也谴责这一组织有政治目的,是滥用《查理周刊》血案。”^③“欧洲反伊斯兰化运动”虽遭受德国政府的压制,但参加者未见显著减少,且活动范围超越了德国的边境,蔓延至比利时、瑞典、奥地利、瑞士和挪威等国。直到“欧洲反伊斯兰化运动”领导人卢茨·巴赫曼(Lutz

^① 李宁:《难民危机背景下德国“伊斯兰恐惧症”升级现象分析》,载《阿拉伯研究论丛》2016年第1期,第235~237页。

^② “Fortress Europe: PEGIDA to be Joined by 14 Anti-Islam Allies for Mass February Protests”, <https://www.rt.com/news/330075-pegida-coalition-mass-protes>, 2018-10-20.

^③ 《德国30个城市爆发反伊斯兰化运动》,载《环球时报》2016年1月13日。

Bachmann) 因“煽动种族仇恨”面临德国德累斯顿检察官的刑事调查而被迫辞职以后，它才在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逐渐销声匿迹。

事实上，反穆斯林、反难民社会思潮的蔓延成为反穆斯林、反移民的欧洲极右翼政党崛起的重要契机。在 2014 ~ 2017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欧洲极右翼政党的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意大利北方联盟、奥地利自由党以及荷兰自由党等，高举反穆斯林、反欧洲伊斯兰化的大旗，赢得了大批选民的鼎力支持。这些政党在欧洲议会的选举中，实现了由处于政治舞台边缘到政治舞台中心的根本性转变。2017 年是欧洲的“大选之年”，更被称为欧洲的“反叛之年”。9 月，德国举行大选，德国另类选择党因其突出反对穆斯林难民政策的政治主张，而获得了德国众多民众的支持，由此一举成为德国政坛上的第三大党，成为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进入德国联邦议会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10 月，奥地利举行大选，同样排外和反对穆斯林难民的极右翼的自由党赢得 20 年来最大胜利，得票率位居第三。其他西欧国家的极右翼政党也同样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了争取选民的支持，欧洲国家的执政党不得不调整政策，在移民、难民问题上，尤其是穆斯林难民问题上迎合民意，收紧移民或难民政策，由此导致整个欧洲政坛的民粹化。欧洲政坛的民粹化不仅反映了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在欧洲的盛行，也反映了欧洲国家民众对穆斯林族群的排斥情绪在急剧上升。

其次，穆斯林难民成为欧洲国家排外主义和极右势力攻击的首要对象，整个欧洲穆斯林族群深受排斥连累且处境更加艰难。自难民危机发生以来，欧洲主流族群与欧洲穆斯林族群的紧张关系明显加剧，伴随着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思潮的崛起，欧洲各国针对难民与穆斯林族群的暴力案件层出不穷。德国自 2015 年 8 月实施欢迎难民政策、大量接受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穆斯林难民以来，尤其是系列暴恐事件的发生，激化了欧洲国家内部排外和极右势力对穆斯林难民的不满与排斥。为了发泄其愤怒，他们不断对以穆斯林为主体的难民及难民营进行暴力攻击。据统计，2017 年德国共有 2 219 起针对难民及难民营的袭击案件，其中针对难民的袭击案件就达到了 1 906 起，针对难民营的袭击则有 313 起。^① 此外，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移民融合

^① 《德国 2017 年发生袭击难民事件共逾 2 000 起》，载网易新闻网：<http://news.163.com/18/0301/16/DBQVKF TE000187V9.htm>，2018 - 10 - 22。

最佳国家的瑞典，在难民潮的冲击之下，也发生了瑞典民众攻击穆斯林难民的种族主义排外事件。2016年1月29日，为报复瑞典难民收容中心工作人员亚历山德拉·梅兹尔被难民刺死事件，约200名蒙面的瑞典籍黑衣人出现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火车站，头戴黑色的巴拉克拉法帽，手臂上系有黑色袖章，散发传单，明确表示要为梅兹尔报仇，并袭击在火车站游荡的摩洛哥青少年穆斯林难民。^①

在穆斯林难民犯罪嫌疑人不断受到暴力攻击的同时，其他穆斯林族群中的普通民众也未能幸免。在无法区分穆斯林中的极端分子、恐怖分子和温和穆斯林的情况下，众多极右分子则偏执地将整个欧洲穆斯林族群看作他们复仇和攻击的目标。2017年3月到6月，英国多次发生由穆斯林移民中宗教极端分子发动的恐怖袭击事件，这加剧了一些英国白人对穆斯林族群的仇恨和复仇。2017年6月，一名48岁的英国人驾驶货车在伦敦芬斯伯里公园附近冲撞穆斯林人群，结果导致1名穆斯林礼拜者死亡、10人受伤。袭击者被抓捕时高喊“杀死所有穆斯林”。伦敦警察局局长克瑞西达·迪克表示，这起事件显然是一次针对穆斯林的袭击。^② 西欧国家针对难民和穆斯林移民的暴力案件的频发，进一步恶化了欧洲主流族群与穆斯林族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伊斯兰恐惧症”盛行的当下，穆斯林族群的被排斥程度日益加深，穆斯林族群的人身安全极易受到反穆斯林极右分子的威胁。

如何全面评价欧洲穆斯林族群在移民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正确区分整个穆斯林族群与穆斯林中个别极端恐怖分子，破解穆斯林后裔们在社会融入、身份认同方面面临的困境，是欧洲各国政府及民众亟待解决的严峻问题。尽管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采取了许多社会融合的措施，如努力实现主流族群与穆斯林族群的平等、消除极右翼政党对穆斯林族群的负面影响，推动大众传媒对穆斯林族群的全面客观的报道等，但仍存在对穆斯林移民的不平等对待之社会现实。欧洲发生多次穆斯林“独狼”式袭击事件，多与社会经济因素有关，不是单纯的宗教冲突。当然，这些宗教极端分子频繁制造的恐怖袭击活动，都使欧洲国家政府所作出的努力大打折扣

^① 《瑞典首都火车站现数百蒙面黑衣人袭击难民为女同胞报仇》，载中国日报网：http://world.chinadaily.com.cn/2016-01/31/content_23326025.htm，2018-10-23。

^② 《英国首相召开紧急会议谴责恐怖袭击行为》，载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7/06-20/8255335.shtml>，2018-11-02。

扣。在族群政治学中，任何族群的一种被排斥或污名化的现象一旦形成，就无法在短时间内予以消除。就这个意义而言，欧洲国家最终解决穆斯林族群被排斥的问题必定是任重而道远，需要探寻一种新的能够弥合族群矛盾的利益整合机制。

Why is There a Social Trend of Rejection of Muslims in Europe?

Song Quancheng & Wen Jing

Abstract: After the September 11 incident, there was a trend of rejection of Muslim communities in Europe, which has intensified after the Arab upheaval, especially after the refugee crisis. The reasons are complex and diverse. The false mirror image of “Islamic threat to Europe” i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factor in which Muslim communities are excluded. The historical conflict memory and realistic terrorist attacks are historical factors and realistic factors that lead to the exclusion of European Muslim communities. The politicization and instrumentalization of ethnic issues are political and media factors that lead to the exclusion of Muslim communities in Europe. The anti - Muslim sentiment of the European people has risen. On the one hand, the rise of the anti - Muslim far - right party has led to the populiz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Muslim communities in Europe is even more difficult. At present, it is urgent for the European governments and peoples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Muslim communitie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hosting countries, correctly distinguish the entire Muslim community from the individual extremist terrorists, and solve the dilemmas faced by Muslim immigrants in terms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Key Words: Exclusionism; European Muslims; Refugee Crisis; “Islamic Threat to Europe”

(责任编辑：冯基华 责任校对：詹世明)